

抗日烽火中故宫文物迁徙之路（上）

1933年3月，太和门广场上等待起运的文物箱件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也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。在神武门展厅一层，展出了一件特别的文物——旧木箱，上面划痕密布，叠压封条，一把老锁锈迹斑斑，向人们诉说着那段慷慨悲壮的岁月：

1933年山海关沦陷后，为防日寇劫毁，故宫博物院1.3万余箱文物精品，从北平迁存上海、南京，后在纷飞战火中，分三路南渡西迁十余省。抗战胜利后，又经历了东归、迁台和北返，历时二十多载，辗转数万里，颠沛流离中完成了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、行程最长、历时最久的“国宝长征”，创造了战争环境下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奇迹。

奇迹背后，是故宫守宝人在破碎山河中的不离不弃，是逃难同胞为国宝让路的深明大义，是国际友人在大轰炸中的凛然守护……



1930年的
国营招商局金
利源码头，故宫
南迁文物箱件
从这里上岸



婶母抓了一包黄土送给他。老太太告诉他，这是家乡土，带上它，无论走到天涯海角，都不会忘记北平。

2月6日清晨，两列满载着故宫文物的火车从北平西站出发，在军队的护卫下一路向南。那一刻，没有人能料到，这些文物中的大多数，也如同随车押运的那志良一样，再也没能回到故地。

“沪上寓公”

首批文物的总押运官，原本是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、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。但由于马衡主持古物馆的古物装箱，无法脱身，只好换人。

易培基想来想去想到吴瀛，几次亲自上门说服。吴瀛虽然不大支持文物南迁，但念及多年同窗情谊，最终慨然应允。1933年2月5日，他率领几名故宫同仁随首批南迁文物从北平出发。

据说，当时日本关东军已派特务侦察情况，准备在文物南迁途中用飞机轰炸。好在故宫早有预防，运送路线没有从北平直奔上海，而是舍近求远，绕道郑州，再走徐州，最后前往上海。沿途经过的地方政府都有军警分段护送，日军的轰炸计划最终落空。

路经徐州一带时，遇上土匪劫车，1000多人在铁路附近埋伏。幸亏地方军队及时发现，和土匪打了一仗。“匪众知道泄露劫宝行为了，而且官方有备，所以退去。我们自然格外兢兢。”吴瀛在《故宫尘梦录》里回忆道。

2月10日，火车缓缓驶入南京下关车站。这时，吴瀛突然接到一个消息——第一批文物，不去上海了。

原来，就在前一天，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、国民党元老张继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紧急提案，建议将故宫文物改运洛阳与西安。他的理由是：“古物运往上海，存入租界，受外国人庇护，是国耻。”

时任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来南京车站接车时，通知吴瀛：列车暂时停靠在站上，先不要卸车。行政院已经打电报到洛阳、西安，如果回电说有地方存储，立刻转运过去。

吴瀛从军政部借了大批油布，盖在火车顶篷上，同时借调了500名官兵，加强防守。2118箱国宝就这样装在火车里，停在铁轨上，原地待命。

3月5日，1054箱古物、图书抵达上海外滩金利源码头，存入上海法租界的一座库房里。其余1064箱文献档案，则运存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大礼堂。

此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，又有四批文物先后运到上海。除了故宫自己的文物，还有古物陈列所、国子监和颐和园的一些文物，加起来一共有19621箱72包零8件。

就在文物迁到上海不久，故宫发生了一件大事。

有人控告易培基非法侵占、盗卖故宫文物，南京最高法院对易培基进行审查。易培基为自证清白，向理事会提出辞职。他在北平、上海、南京的房产被查封，财产也被没收，不得已逃到上海避难，于1937年在上海郁郁而终，年仅57岁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这起“故宫盗宝案”被证实是一桩“凭空捏造”的冤案，但在当时却把故宫推向了风口浪尖。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，选举继任者。故宫博物院理事于右任推荐马衡为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，全体通过。

马衡是北京大学教授、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，1924年受聘于清室善后委员会参加清点故宫文物的工作。他不但是故宫博物院草创时期的元老，而且是有名的金石学家，有很高的社会声望。然而，马衡却再三婉拒。最后，身为理事会理事的蒋介石发话，无奈之下，马衡向理事会提出三个条件：就任院长只理院务，不问“易案”，对故宫文物进行重新点查造册；以无党派人士身份任职；对故宫博物院进行全面改组，院长对院内人事安排有处置权。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一一通过照准，马衡这才于1934年4月正式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。

马衡上任时，文物南迁已告一段落，对迁沪文物进行点收成了头等大事。故宫文物从北平起运时，由于事起仓促、时间紧迫，账册记载相对简单。这次点收规定，每件文物的质地、色彩、尺寸、款式都必须写在文物单上，一式两份。一份装箱时封在箱子里，一份装订成册，汇集为《存沪文物点收清册》。这份册子成为故宫南迁文物最完整的账册。

清点文物时，需要给每件文物编号。清室善后委员会曾按《千字文》顺序，即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”为文物编号。马衡一改前例，把故宫1.3万余件木箱分为四大部门，编成四个代表的简字。古物馆箱用“沪”字，图书馆箱用“上”字，文献馆箱用“寓”字，秘书处箱用“公”字，连在一起，所有文物便成了——沪上寓公。

“寓公”在古代指失掉领地而寄居他国的贵族。把迁沪文物比作“寓公”，在庄尚严看来，是马衡“对这些无价国宝幽了一默，而事实确实如此。”

1936年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议，在南京筹建分院及永久性库房。教育部把金陵名胜朝天宫拨给了故宫博物院。1937年1月1日，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，在上海存放了四年的故宫文物被全部运到那里。

国宝的漂泊之旅眼看就要结束，然而，仅仅七个月之后，日寇的铁蹄就逼近了这座六朝古都。

据北京日报

“文化一亡，永无补救”

1933年2月5日，夜幕低垂，故宫博物院大门打开。一大批人力车夫拉着排子车，匆匆进入神武门。

太和门前广场上，摆满了贴着封条的大木箱。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身披斗篷，现场坐镇指挥，一件件木箱被有序运出太和门，经过午门，直奔北平西站。这些木箱里装的是故宫精挑细选的文物，是举世无双的国宝。它们，要与日寇的炮火“赛跑”。

早在1931年，九一八事变后，易培基就开始酝酿故宫文物南迁一事。

易培基是故宫博物院的缔造者之一。1924年，他在北洋政府任教育总长，与同是国民党元老的李煜瀛一起，策动冯玉祥驱溥仪出宫。故宫收归国有后，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，易培基是其核心成员。1928年北伐成功后，易培基被委任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。

清室善后委员会曾于1924年召集上千人，用了5年多时间，第一次摸清了故宫的家底——117万余件文物。其中，像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、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、宋徽宗《听琴图》等，很多都是绝世珍品，是中华民族千年文脉的见证。

“北平安静，原物仍运还”

故宫文物数量巨大，装箱、搬迁都是大工程。

当时，故宫有古物、图书、文献三馆。各馆自行装箱，其他散在各宫殿不为三馆提管的，由秘书处装箱。文物装箱难易不同。据时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科长的庄尚严回忆，最容易装的是图书，其次是图册档案，最难装的是古物。“如瓷器，有的其薄如纸，有的其大如缸，又如铜器，看其形状似乎坚强，可是一碰就碎。”

故宫工作人员，很多都像庄尚严一样是刚出校门不久的学生，“没有一个人对装箱稍有经验”。他们只得师法前人——打开库房，找几个乾隆以来，由

景德镇运到宫中原封未动的装瓷器的箱子，打开来看看是怎么包装的。接着又去琉璃厂各大古玩商店，打听他们如何把古玩装箱出口，并请老师傅们上门演示。

起初，故宫为了省钱，用的是装过纸烟的旧木箱。木板很薄，手扶上去晃晃悠悠。棉花也是回笼的“黑心棉”，味道极难闻。装箱的员工们有意见：这样弱不禁风的箱子装文物，路上万一有闪失，谁来担责？

于是，故宫把“黑心棉”换成新棉花，专门定制了一大批长1米，高、宽各0.5米的新木箱。一车一车空木箱、棉花，声势浩大地往神武门里拉。整个故宫叮当作响，一片繁忙。

历时近一年，故宫总共打包了13427箱64包文物，包括散氏盘、嘉量等青铜重器，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、宋徽宗《听琴图》等书画名品，以及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等珍贵古籍。

1933年2月5日夜，首批文物2118箱从故宫起运。时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科长欧阳道达描述当时情景：“仓皇急遽，如救焚拯溺，呼吸之际，间不容发。”在那志良的记忆中，“当时非常寂静，除了车辆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。没人说话，也没人唱歌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。”

那志良是首批文物押运人员之一。时年25岁的他，第一次离开北平。临行前，他的



日前，故宫神武门展厅展出了一件文物南迁时期的旧木箱